

《人民日报》专版上的开国大典

郑学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吸引了中外众多新闻记者采访报道，《人民日报》派出多路记者采访，记者、编辑们通宵达旦地赶写稿子、编排版面。10月2日出版的报纸除了一版的新闻报道外，还在第四版开辟专版，刊登记者采写的通讯和新闻特写，图文并茂，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当年盛况留下了更多宝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震撼世界的声音

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记者林韦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采访报道工作，采写了通讯《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他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这一声震撼世界的巨响，由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响亮地喊出的时候，参加盛典的30万群众中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欢呼，红底五星的国旗徐徐升上22公尺的高竿，54门大炮齐鸣，军乐队奏起十多年前曾经激发无数万爱国人民向日本帝国主义冲锋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时间是10月1日下午3时。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林韦写道：

经历过无数次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这个可珍贵的时刻：它宣布了旧中国完全死亡，宣布了人民的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中国人，将不再是屈辱的殖民地与殖民地奴役者的代名词，而要永远地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尊敬了。

特种部队引人注目

毛泽东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检阅毕，朱德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之后，举行分列式。

人民解放军华北炮兵第2旅第1团第2营5连参加了检阅，这支部队的大炮，包括美国造的15厘米口径和10.5厘米口径的榴弹炮、三七高射炮；也有日本造的九零野炮、三八野炮、七五高射炮。战车部队包括美造坦克、日造坦克、美国装甲汽车等。

记者而东、江夏在《祖国的坚强守卫者》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这支部队的光荣战史。他们用1945年缴获日军的3门九零式75毫米野炮，在太原战役决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第四版

战以前，以劣势地位坚持6个月零20天的奋战，有效地控制敌人6个机场，前后击毁敌机9架。炮手在1.5万米之外，不移炮位地连续击中了敌人，创造了炮战的奇迹。敌人的前沿阵地离这3门炮很近，每天都用几百发炮弹来打，最紧张的三四天里，每天落在他们前后左右的炮弹达到1400多发，但由于工事和伪装巧妙运用，他们始终屹立于同一阵地，未被敌人击中。敌人还派兵来夜摸，派飞机来轰炸，都以失败告终。5连的战士们英勇顽强，百战成钢，在战斗中越发明显沉着坚定。他们在战斗空隙，还帮助当地群众挑水、秋收，学习文化，在半年时间内，全连战士消除了文盲，人人识字，还出阵地小报73期。战后全连荣立大功，获得了18兵团“威震敌胆”和太原前线指挥部“英勇命中，连毁敌机”的锦旗各一面。

红色的战斗机群

1949年10月1日一大早，《人民日报》女记者陈柏生和同事张业乘乘来到南苑机场采访，写下了通讯《我们飞行在人民首都的上空》。

下午4时，南苑机场受阅空中纵队指挥室接到起飞命令，机场上立刻响起雷霆万钧般的马达声。受阅机群按规定依次起飞。飞机按照合练、试飞的规定航线、高度、速度出航，进入通县的双桥镇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

终于，“北京出现在我们眼前，琉璃瓦的宫殿，红色的墙门，整齐的街

道，这庄严的人民首都，愈加显得庄严美丽了。摄影机响了，天安门出现在机翼下面，数不清的红旗和黑压压的人群连成一片，地面的装甲部队正缓缓行进在司令台前。发动机的轰鸣充满了人民首都的上空，从空中鸟瞰，只见人群晃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定见到我们了！’大家心里都这样想，希望机群能再往北京上空转一回。但是这不在检阅程序规定之内，我们只得奔飞机场而去了。当我们又降落到原来的跑道上时，大队长赶紧跑来告诉飞行员同志们，‘我们的队伍整齐威武，赢得了北京人民的热烈欢呼！’（《我们飞行在人民首都的上空》）

当日，《人民日报》编辑、诗人马凡陀也乘飞机飞越天安门上空，目睹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写了一首诗《红色的战斗机群》，发表在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共和国的元旦，我跟随我们自己的空军，坐着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北京上空！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红色的战斗机群，三架接着三架，打天安门前飞过，打毛主席的手臂下飞过，数不清的红旗飘动，数不清的手臂挥动……”

在不眠之夜中迎来新曙光

3个小时的阅兵结束后，天黑了下来，天安门城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天安门四周焰火升起，满天彩星飞逝，遍地火龙翻滚，浩浩荡荡的提灯游行开始了。

游行队伍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声中，按东西两路行进，以工人为先导，农民跟进，机关人员、学生、部队……《人民日报》记者寒青在《首都十月一日之夜》中写道：“从西长安街到东长安街，从王府井到王府大街，从西单到西四……游行的队伍被夹道欢呼的人群堵塞，两个单位并列前进已经不可能了。游行的队伍走到哪里，就和夹道群众的掌声连成一片，口号声连成一片。”

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站立着为数众多的老年人，他们有的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观看，这些老人平时很少出门，东单大街保康大药房门前的刘老先生说，他们今天是要来看看这“万年不遇的大喜事”。

寒青还描写了一支没有经过组织的特殊游行队伍：“王府井北口，突然卷起一阵急骤的掌声，乐队来了，180件乐器齐奏着《团结就是力量》……乐队的两旁，跟随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支特别的游行队伍，这是一支没有组织的队伍，可是他被乐队组织起来了。他们与乐队并列行进，他们鼓掌，他们欢呼。马路两旁一群一群的小孩，连那些还刚刚进小学的在内，随着乐声，拍着小手，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团结就是力量’……这情景，给一位酱园掌柜以很深的感动，他意味深长地说：‘这真是与民同乐。’当游行队伍离开会场两个半小时的时候，整个首都已经为不息的欢呼声所震撼。可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还有长长的行列，正有秩序地踏出会场呢。”

京城4万多名学生排成了一队队白色的、蓝色的、黑色的队形，他们高举着鲜花、红旗、灯笼，昂首高歌，朝气蓬勃地涌向天安门城楼。他们“30个人横成一排，大纵队行进走过主席台前向毛主席致敬，让毛主席来检阅一下北京学生的队伍；只见贝满女中一丈二高的红纱扎的大红星，电灯泡在上面闪闪发光；慕贞女中一色白衣白裤白鞋，纯白色队伍中的红灯笼分外鲜艳；清华大学的化工系扎了一所化工厂和一座大锅炉，上面写着‘发展重工业’来表示他们的志愿；航空系扎了一架大飞机，上面写着‘巩固国防’，机械系做的坦克模型和真的一样，里面还坐着一个学生扮成的坦克手……”（金凤《毛主席检阅学生队伍》）

毛泽东看到这支散发着青春活力的队伍走来，通过扩音器吩咐工作人员把水银灯打亮，他要仔细地看看新中国年轻幸福的一代。走在学生队伍最后的是华北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1.4万名学生，他们以八根火炬为前导，豪情满怀地直抵天安门前的白玉石桥上，激动地向毛主席致敬。队伍中的十面大红旗迎风招展，数百支火把熊熊闪耀，学生手中的红灯、花灯，汇成一片灯海。“学生们望见了毛主席在不断地挥手致意，不断地举手鼓掌，不断地高呼‘同志们万岁’时，他们欣喜若狂，把帽子抛向天空，把红灯高高举起，直向桥上飞奔，欢乐地歌唱……”当学生们从三座白玉石桥上走过时，犹如一条矫健的火龙翻腾而过。

群众游行结束后，人们仍然不愿离开天安门广场。这时，无数彩色的礼花向广场四周发射出来，军民们载歌载舞，在不眠之夜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缕曙光。

（作者为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

从未提及这个细节。

据说，油画《开国大典》不仅是为了展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性时刻，也是为了弥补朱德不在照片中的一个历史性的遗憾。

其实，据特批上天安门的三名摄影记者之一的女摄影家侯波回忆，帮助摄影记者拍摄的也不止朱德一位领导人。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侯波就要不停地跟拍。当看到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右边时，侯波想拍一个带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侧身镜头，但由于空间有限，她只能冒着危险将身体探出前廊边的矮墙，一再往后撤身子，但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拍完后，侯波收回身体扭头一看，帮忙的人竟然是周恩来。过了一会儿，侯波又急忙换到另一个位置，也需要把身体伸向护栏外。陈云主动伸过手来，抓住侯波的衣袖说：“我来帮你，赶快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种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风范令人温暖而又景仰。

身边，为什么拍照时不在呢？原来，由于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偏窄、空间有限，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加起来多达623人。在并不宽敞的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想要拍摄出一张完整的照片无疑是一件难事。

被批准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的只有三个人，当时在东北画报任摄影记者的陈正青是其中一员，担任着关键的拍摄任务。为了寻找最佳拍摄角度，完整地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陈正青只能倚着天安门城楼的汉白玉栏杆，尽量将身体往后仰以便能拍出更完整的画面。但是专注拍摄的陈正青并没有意识到可能坠落的危险。而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朱德为了腾出空间，方便记者们拍摄，从领袖

们站立的前排人群中退后一步，当他发现陈正青拍摄的险情时，急忙快步冲上前去，用双手紧紧地抱住陈正青的双腿，帮助他完成了拍摄。朱德自己却留在了镜头之外。

在俄罗斯第一频道曾播放的中国彩色纪录片《中国的重生》第二集《伟人毛泽东》中，记录1949年开国大典的彩色影像也显示，确实有记者将半个身子探出围栏进行拍摄。而在其他视频片段中也能看到，在毛泽东发表讲话时，朱德站在下方围栏外的位置。当时在天安门城楼担负警卫工作、身为朱德贴身警卫的管开智也证实朱德退让位置并救助记者一事。而在有关朱德自己的回忆和文集中，却

开国大典照片中为何没有朱德

王厚明

油画《开国大典》中，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站立其中，也包括意气风发的朱德。然而在记者陈正青拍摄的经典传世照片《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却并没有朱德的身影。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毫无疑问应该站在毛泽东身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历史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国大典当天毛泽东和朱德一同走上天安门城楼，朱德多数时间也确实站在毛泽东

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

俞青霞

1932年的一天，瞿秋白和鲁迅在北川公寓第一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许广平回忆当时的场景说：“他们两人就像我从菜市场带回的两尾鱼，拿到家中忽然放到水池中见着水，游得欢快。”他们从日常生活谈到彼此的遭遇，又从淞沪抗战谈到中国革命，滔滔不绝。后来瞿秋白多次写信给鲁迅，谈他对整理中国文学史和翻译问题的意见，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在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面临危险时，鲁迅曾4次收留瞿秋白到家中避难。1933年，鲁迅为瞿秋白租下了一个亭子间，与自己的住所仅一条马路之隔。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回忆说：“鲁迅几乎每天到日照里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时事、政治、文艺等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后，不得不开始长征。留在苏区的瞿秋白不幸被捕，随即给鲁迅写了封求救信，鲁迅多次托人援救，但都无功而返。1935年6月18日上午，年仅36岁的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噩耗传来，病中的鲁迅抑制住悲痛和愤怒，与秋白的几位好友商议收集秋白的译文，为他编辑出版《海上述林》。鲁迅先生不顾肺病缠身，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夜以继日地编辑、校对。《海上述林》上卷刚出版不久，鲁迅先生不幸病逝。鲁迅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够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在瞿秋白纪念馆的展厅里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先生亲笔手书赠送给瞿秋白的，也是两人友情最好的见证。

胡适成人之美

张雨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有一句极为有名的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当时，能和胡适成为朋友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胡适身为一代学术宗师，却从不摆谱、毫无架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总是竭尽全力、不遗余力地扶持、鼓励提携新人，助其成功。

1923年，福州协和大学找到胡适，请他帮助推荐一名能胜任国文系主任且是教授的人员。胡适经过慎重考虑，推荐了赋闲在家的郭绍虞。然而郭绍虞当时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他的学历只有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一年级。但后来自学成才，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和书法家。

胡适的一位朋友说：“这个人，一向清高，一没有进过大学学堂，二没有留洋背景，你竟如此力排众

议地推荐他，一旦出现差错，你就不怕影响自己的声誉吗？”胡适摆摆手说：“时时在意自己的名声，置他人的困难于不顾，难道就是谦谦君子吗？”在胡适的鼎力帮助下，郭绍虞登上了大学讲坛。郭绍虞一生手不释卷、勤奋好学，在学术上取得令人仰慕的成就，到了暮年卧床不起，仍备一小桌于榻上，伏案写作不停。

胡适慧眼识才，他欣赏郭绍虞的才华与勤奋，不顾委托人提出的要求，举荐没有任何文凭的郭绍虞，使他有了一展身手的用武之地。胡适举贤任能敢于打破常规、为人着想的可贵品质让郭绍虞感念终身，也让世人所敬仰。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胡适善于成全别人的好事，是一种难得的美德，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他的成人之美的做人风范，令后世学人敬仰和学习。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崔鹤同

1941年初夏，张大千来到莫高窟，对石窟进行实地考察，并临摹了大小276幅壁画。

当时有很多洞窟被沙堵了，张大千就出钱请人小心地把沙刨开，或是挖个洞钻进去临摹。洞里很黑，临摹时点上蜡烛，有时一手拿蜡烛一手画画，还要爬上爬下，冷天冻得手连笔都拿不住，经常是一头沙土，一身颜色。张大千对临摹的画要求严格，不合格的一律返工。

张大千临摹的壁画，把颜色都复原了，画出来的就跟新的一样，非常鲜艳，甚至壁画上不好的地方他都给改好了。

张大千不辞劳瘁风沙之苦，夜以继日，经年累月，架云梯、攀高壁，奋臂摹画，单是石青、石绿，就消耗了千两斤。张大千自筹川资，在两年多时间里，白天在石窟中苦苦面壁，夜晚宿在破庙里。据悉，其一切费用高达

5000多两白银，入不敷出，负债累累，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古画卖掉，维持用度。有些人不理解，认为哪里不能追求艺术，却偏偏要跑到西北大沙漠去，自讨苦吃。张大千从不介意，一笑置之。他去敦煌时43岁，正是精力旺盛之年，但历经近3年的风霜之苦，归来时，倍显苍老，长长的胡须已经花白。

1943年8月中旬，“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和“张大千画展”在兰州开幕。1944年1月和5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展出。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观看后，欣然题诗相赠：

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葱苌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现收藏在四川博物院。

地质学家袁复礼的考古故事

付裕

1915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的袁复礼赴美深造，在布朗大学学习生物学、考古学、植物学等课程。1917年，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学习地质学。

20世纪2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连年战乱的中国，袁复礼毅然回国，并迅速投入到地质调查工作中。1922年1月27日，袁复礼参与创建中国地质学会，这也是我国成立最早的自然科学学会之一，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发展中国地质事业起着重要作用。1923年，袁复礼先后在兰州、张掖等地找寻含煤地层、调查旧煤窑，评价可供开采的煤田。其间，在平凉找到了奥陶纪的笔石化石，在武威西南发现了丰富的海相化石，首次确定了我国有早石炭世晚期地层，为研究我国石炭系地层及生物对比和古地理打下了基础。

虽然是一位地质学家，但袁复礼对考古学颇有兴趣。1921年，袁复礼跟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在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在发掘过程中，袁复礼不仅对遗址进行了全面测量，还绘制了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幅等高线地图——《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线图》，这幅遗址地形图成为后来的考古调查工作提供了精准的科学依据。

在仰韶文化遗址发掘过程中，袁复礼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主持日常发掘工作，并发掘实物包括骨器、石器、陶器等。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研究的序幕，填补了中国考古文化发展史的空白，袁复礼也被考古界誉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